

BIJIAOWENXUE

郑州大学出版社



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

吕伟民 郭英剑 编著

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吕伟民,郭英剑编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6

ISBN 7-81048-734-5

I. 比… II. ①吕…②郭…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
研究-世界-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7282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邮政编码:450052)

出版人:谷振清

发行部电话:0371-696607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教育厅印刷厂印制

开本:850 mm × 1 168 mm

1/32

印张:8.625

字数:215 千字

版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1048-734-5/G·25 定价: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 言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猛烈地冲击着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比较文学学科似乎看到了自身发展的一个新机遇。比较文学以“跨”(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为学科自身的主要特征,寻求在“跨”的过程中发现、把握、总结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不仅为人类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为人类各文化间的沟通、融合乃至共同发展做出贡献。比较文学的这一特征,恰与当今的“全球化”趋势有某些相似之处。从跨越和沟通国家、民族、文化的界线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比较文学本身的兴起,就为“全球化”趋势的形成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繁荣与深入发展,比较文学学科的名称与地位在中国高校和学术界的确立,即为一例。

比较文学的“跨”的性质,要求比较文学学者起码有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文学的了解作为研究的基础,而如果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上,那么,被学者拿来与中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肯定就是“外国文学”了。因此,了解外国文学对中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实,了解外国文学不仅对比较文学研究很重要,而且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外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其本身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样,比较文学就必然地与外国文学连在了一起。

现在,人们给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相结合的学科命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按笔者的理解,这里的“世界文学”,大致相当于过去人们所说的“外国文学”,而不是歌德所说的那个“世界文学”。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应该是经过了比较充分的沟通融合之后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一个共同体,按许多学者设想,那应该比较文学充分发展后的一个结果,应是人类文学发展的崭新阶段,而人类文学的现状似乎距此甚远。尽管如此,歌德所描绘的“世界文学”的美好前景,毕竟是一个值得人们为它做出努力的目标,而重视发展比较文学研究,则是达此目标的一个必由之路。从这个角度着眼,笔者看到了给“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命名的合理性。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需要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个学科在今日中国的繁荣发展,就是由国内许多学者的辛勤努力促成的。本论文集所收论文的作者,都是在郑州大学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相关专业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学者,本论文集所收论文,有些是作者们以前曾经发表过的旧作,有些则是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本论文集所收论文的内容,包括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中外文学流派比较研究,中外作家、作品比较研究,中外文学体裁、题材发展演变比较研究以及外国作家、作品研究等。尽管这些论文中还存在一些不足甚或谬误之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们为促进“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作为编撰者,我们希望以此论文集来为推动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微薄的贡献。

编者

目 录

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文学性”问题浅谈	吕伟民(1)
观看与想像	
——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	张 月(9)
原始基型与感性具象	张 月(21)
中西美学存在方式的变化	耿海英(31)
中西文学艺术家的精神生态	张 月(36)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死亡与永生主题	张 宁(67)
既成叙事 平民文化 都会经济	
——中国戏曲的晚熟与希腊戏剧、印度梵剧的早生	
.....	乐 铎(86)
古希腊悲剧的成因与元杂剧的正剧性	乐 铎(99)
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创作与西方现代主义	张鸿声(117)
悲剧:社会与人	
——奥尼尔与曹禺的悲剧观念	张鸿声(135)
郑振铎与印度文学	牛水莲(148)
理想的建立与破灭	
——“大观园”与“六条院”的比较	牛水莲(161)
《边城》与《古都》艺术风格之比较	牛水莲(170)

时间·存在·文学

——比较文学读书札记 吕伟民(178)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乎?

——比较文学读书札记 吕伟民(184)

世界文学

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 郭英剑(190)

追问女性的生存状态

——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别名格雷斯》

..... 郭英剑(199)

索尔·贝娄:美国文坛的长青树

——简评《贝娄传》 郭英剑(210)

爱、时间与死亡 张 宁(214)

《哈姆莱特》:另一种肖像 张 宁(225)

《教师》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刘云波(231)

《“水仙号”的黑水手》的双重叙事结构 吕伟民(238)

从“失乐园”到“复乐园”

——谈《吉姆爷》的道德探索 吕伟民(247)

《大师与玛格丽特》与圣经 耿海英(257)

比较文学“文学性”问题浅谈

吕伟民

作为文学研究分支学科之一的比较文学,“文学性”应是其不言自明、理所当然的基本属性,但是,比较文学学科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却一再对这看似理所当然的基本属性提出挑战。对比较文学“文学性”问题的认识,从小的方面看,影响着比较文学具体课题的选择与研究,从大的方面看,则影响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命运与发展方向。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探讨。

较早对比较文学提出“文学性”问题的,应算是美国学者雷内·韦勒克。在发表于1958年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雷内·韦勒克针对法国学派长期片面强调“影响研究”的情况指出,法国学者“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这一愿望,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研究二流作家,研究翻译、游记和‘媒介物’。一言以蔽之,它使比较文学成了只不过是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①法国学者的这种做法使比较文学面临着一个严重危机:即“把文学研究归并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研究之中”,甚至“使它几乎等于整个人类史”。换句话说,法国学者的做法将使比较文学丧失其文学特性,从而丧失其自身的存在基础。根据这种情况,韦勒克大声疾呼:“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

韦勒克的指责,确实击中了法国学派的要害。从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的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几十年中,法国学派

的学者们“用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唯事实主义观点看待文学研究”，在“欧洲中心论”思想影响下，把比较文学研究仅局限于西方文化的范围内，“并且只把‘事实联系’、来源和影响、媒介和作家的声誉作为唯一的课题。”这种人为的作茧自缚的状况严重阻碍着比较文学的发展，因此，在韦勒克等许多学者眼中，这样的“比较文学已成为一潭死水”。为改变这种状况，韦勒克提出，比较文学要重视文学“内在性”的研究。所谓“内在性”的研究，就是对文学作品自身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文学性”的研究。虽然韦勒克比较欣赏新批评派的观点，他所说的“文学性”研究更接近于新批评派所主张与擅长的文本本身的分析研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文学性”问题的提出，毕竟纠正了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贸易交往”式的偏差，把比较文学又拉回到文学的范围内。

二十世纪中期兴起的、以韦勒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在纠正法国学派的偏差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学派自己的观点却从另一个方面也向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提出了挑战。

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雷马克的定义代表了多数美国学者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的最大区别，在于提出了“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雷马克认为，这是“‘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间阵线分明的根本分歧”。雷马克的定义，表明比较文学研究中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相对应又互补的“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的出现。

美国学派提倡“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原因，一则在于他们本国文学的发展时间短，对其他国家文学产生的影响有限，如

韦勒克所说,美国文学“可供吹嘘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再则,也是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对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的更宽泛的理解。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辅助学科,是连贯各片较小的地区性文学的环节,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连接起来的桥梁”。它的任务是“使学者、教师、学生以及广大读者能更好、更全面地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要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与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可以说,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提出的“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为比较文学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其更好地向前发展。但是,美国学派的某些观点,特别是“跨学科研究”的主张,也使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在日益扩大的研究范围中受到冲击。在一些美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论著中,研究范围无限制地扩大,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方面的内容日益增多,甚至占据了中心地位,而文学反倒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比较文学的研究成了非文学的研究。这样的状况又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于是,要不要以及如何坚持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又成了人们讨论的话题。

美国学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是反对在比较文学中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他说:“从理论上讲,文学研究要想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必须不再去研究非文学的现象,而集中探讨文学现象。”“我以为把研究领域扩展到那么大的程度,无异于耗散掉需要巩固现有领域的力量。因为作为比较学者,我们现有的领域不是不够,而是太大了。”他还明确地说:“我的同道中有些纯粹派,希望把比较文学严格地限制在文学的范围内。”^②韦斯坦因反对进行“跨学科研究”,有其对具体研究可能性的考虑。比如他认为,“在比较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时,浅薄比附的闸门常常会被冲开,文学史家或批评家常常会发现,他们对自己力图与文学作比较研究的学科并不很了解,缺乏这方面富有见解的第一手资料。”^③但是,他考虑

更多的,还是对比较文学“文学性”的坚持。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在一个极大拓展了的范围中迷失了文学性方向的比较文学,将再次面临失去自我的危险。在谈到文学“与其他缪斯管辖下的领域有某种自然的亲缘关系”,因而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因素”时,韦斯坦因承认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只不过他“倾向于把纯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称为‘比较的研究’。”称“跨学科研究”为“比较的研究”而不是“比较文学研究”,这种命名本身就显示出韦斯坦因坚持比较文学学科“文学性”的鲜明态度。韦斯坦因及其所代表的“同道”们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质疑与抵制,实质上也是对比较文学非文学化的一次“纠偏”。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比较文学领域关于流派的争论渐趋沉寂。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学者们在经过论争与思考后,观点逐渐接近。正如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佛克马所说,论争之后,学者们所主要关心的是理论的探讨和问题的研究。^④然而,比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并没有就此消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受科学研究领域各学科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发展趋势的影响,比较文学研究中又出现了“泛文化”的倾向。

“泛文化”的倾向与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有相似之处。在一些非文学化倾向比较突出的“跨学科研究”课题中,文学被其他学科的内容所排挤,失去中心地位,比较文学的研究就带有了“泛文化”的意味。但在“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中,文学还能保住其中心地位。如雷马克就把比较文学的任务明确规定为使读者能“更好、更全面地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可以说,“泛文化”在许多“跨学科研究”中还只是一种偏激现象。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泛文化”倾向中,文学在比较文学中失去中心地位的情况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有学者明确指出:“第十四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94,加拿大)给人最深的总体印象就

是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没’。”^⑤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有些学者就公开主张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姆在题为《跨世纪的比较文学》的学科现状报告中直接建议,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心应由文学转向文化”。^⑥如果说,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在以前遇到的挑战还是间接的、无意识的,那么,它现在所遇到的挑战则是直接的和有意识的,其危险性也更大。面对这样的挑战,人们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心从文学转向了文化,那么,它还是一个文学研究的分支学科吗?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大到无所不包(泛文化)时,人们将如何为其定性与命名?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否意味着作为一门文学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消亡?

从理论上讲,比较文学“文学性”遇到的挑战,其实就是比较文学学科遇到的挑战,因为失去了“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将同时失去其自身。如果我们恪守传统的、字面意义上的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解,得出上述结论应该是件符合逻辑的、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在考虑比较文学的情况时,还不能下这样过于简单和直截了当的结论。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还应从另一个方面,即比较文学的特殊性来考虑。只有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清比较文学学科的特殊历史地位与作用,才能对其发展趋势采取正确的态度。

比较文学学科虽然已形成一百多年了,但相对于文学研究的其他分支学科(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来说,其发展历史最短,因而其自身特性与涉及范围等也相对模糊。在形成之初,人们赋予它的任务是突破传统文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划分,采用一种新的视角来研究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因为从一开始,比较文学所关注的就是“不同文学、不同时代间的不断对话。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国际的视角,独特的方式——‘跨’(跨文学、跨文化)的方式、对话的方式,使比较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呈现为一个开放

的体系”。^⑦在十九世纪后期,比较文学的“开放性”表现在对国别文学研究领域的突破,由此使得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向学者们“开放”的新的领域,比较文学学科也由此得以立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派的出现,再一次体现了比较文学的“开放性”。美国学派的观点不仅突破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事实联系”的局限,开创了“平行研究”的新领域,而且还突破了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局限,把“跨学科研究”也划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地盘,促成了比较文学的一次大的发展。虽然,“开放性”这一特点使得比较文学显得有些不太稳定,比较文学研究每一次对自身的突破,都带来短期“失范”后的迷茫,甚至一再使其学科本身遇到“危机”,使得人们对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产生疑虑;但是,也正是“开放性”的特点,使得比较文学能不断突破自身局限,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在实践中不断取得其他学科难以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文学研究作出独特的贡献,从而不仅证明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还能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开放性”特点使比较文学的“文学性”一再受到冲击和威胁,而比较文学的生命力又有赖于它的开放性,这是一对儿由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所设定的根本矛盾,而比较文学学科恰恰就在这一对儿矛盾的冲突与转化中向前发展。这应该算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个特点既说明了为什么比较文学会一次次遇到危机,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它能一次次克服危机、获得新的发展。现在,当有人因“泛文化”倾向的出现而为比较文学的命运担忧时,采取一种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并根据比较文学的特殊性来对待这个问题,肯定将是有益的。我们可用比较文学中形象学研究的情况为例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近年来在欧洲及亚洲许多国家比较兴盛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是受二十世纪西方形象学研究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这种背景使它与以往的“纯文学”的研究相比具有了明显的“文化”意味。

比较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由于这种研究是全方位的,跨学科性的,是“处于人类学、社会学、史学、文学研究交叉口上的”^⑧,由此可以推断,这种研究是非常容易走向“泛文化”的。法国著名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曾说:“对于像比较文学这样的学科来说,形象学可以自塑为一个先锋者。由于比较文学向所有的异国文化开放,它讨论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极其多样,因此它完全可以成为一门‘人文科学’。……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鉴于比较文学要研究的某些领域,它是否野心勃勃地希望成为一种并不否定文学特性的‘人文科学’呢?”尽管在明显“泛文化”的“人文科学”中,比较文学能否保住其“文学特性”是令人担忧的,但巴柔教授特意提到“并不否定文学特性”,却也表明了一种态度,这就是:比较文学的“特性”是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可以扩大,它的外延部分可以大大延伸,但作为其特性及中心的文学性则仍要坚持。巴柔教授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在《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一文中,我国学者孟华在总结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及现状后,专门对比了其与普通文化研究的区别,她说:“文化研究是从社会构造、文化形式、日常生活框架入手,主要考察的是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等方面的情况和现象,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要批判现实,找到替换性的生活模式。而形象学研究则是从文学作品入手,最后仍要回归文学。此类研究尽管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目的却是进行文学研究,并且是跨文化、跨语言的文学研究,探讨的是国际文学关系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总之,形象学最终仍要回归文学,目标指向文学作品中对异国描述的总和,尽管这个结果对其他学科肯定具有参考价值。”从对比较文学形象学具体研究实践的观察(如孟华对“套话”时间性的研究)可以看到,尽管这类研究在具体过程中涉及大量史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等方面的材料,“文化”含量很高,但由于研究者是从文学作品

入手,最后又回归到了文学,得出了文学性很突出的结论,所以其“文学性”并没有失去。不仅如此,由于大量“文化”成分的介入,文学研究被赋予了新的视角、新的工具,文学形象的深度空间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拓展,这对文学自身的发展将会起到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这类研究的结果“对其他学科肯定具有参考价值”,因而,它的推动作用又是双向的,互动的。这样一种“双赢”的结局理应受到欢迎,同时,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这种发展趋势对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趋势也就具有了示范的意义。

“文学性”是比较文学的基本属性,失去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将不成其为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中,曾出现过偏离文学性的倾向,但偏离后的回归更说明了文学性对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性。在各学科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已成为普遍发展趋势的今天,比较文学无疑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大胆借鉴、利用其他学科各种有益的成果,以求自身获得新的发展;但同时,对“文学性”的坚持仍是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任务,因为这毕竟是它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注 释

①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②、③乌尔利希·韦斯坦因著:《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5页

④乐黛云,王宁主编:《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⑤、⑥黄维梁,曹顺庆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台港学者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⑦、⑧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观看与想像

——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

张 月

形象学是近年来在欧洲大陆蓬勃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由比较文学大师让-玛丽·卡雷创立,经由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让-马克·莫哈、基亚、米歇尔·卡多、米丽耶·德特利、胡戈·迪塞林克、布吕奈尔等人发扬光大,现已成为比较文学中极具扩张能力的前沿性学术研究领域。目前,这一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体现在巴柔的《形象》、《形象学研究:从文学史到诗学》、《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像物》,莫哈的《试论文学形象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及《文学形象与神话批评》之中。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孟华教授已将这些论文与其他有关形象学的论文编译成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冠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书名出版。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意义上,并非一般性的关于形象的总体研究,而是关于异国(the Other)形象即以国家为单位的他者形象的研究。这里的“异国形象”,按照巴柔的界定,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的认识的总和”^①,也就是形象的塑造者和表现者所获取的这种认识的总体。

一、形象的塑造与观看

形象的塑造和表现所涉及的最直接要素是形象的来源和形象的塑造者或表现者,二者处于一种共生关系之中。没有异国作为他者的存在,形象的塑造者就没有了形象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如果

没有形象的塑造者,也就不可能有形象的塑造。然而,形象的塑造绝非是对他者现实表象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它涉及到诸多因素,并皆现身于二者的关系形态之中。

他者形象与塑造者处于一种不可或缺的必然联系之中,二者之间交互作用。由于形象的生产过程涉及的第一个行为是“观看”,因此,形象的塑造者首先便以注视者的身份出现,作为他者的异国则成为被注视者。虽然在双方的关系之中注视者与被注视者表现出了某种互动性,借用巴柔的表述即为“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给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②,但在这种关系中,注视者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决定如何去看的不是被注视者,而是注视者。当然,注视者择用的注视他者的方式并非是任意的,它必然要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几种:

时间和距离 作为观者,他只能看到他观看时间内的他者,而观看时间的长度就会影响到观看的方式。这对观看和塑造异国形象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远与近,决定了观看的清晰与模糊,细微与简略,兴趣盎然或索然。

频次 观看频次的高与低,会使观者得到的他者印象有所不同。低频次的观看会使对象局部化、单维度化,对他者的形象把握也会流于粗浅浮泛和支离破碎;而高频次的观看,则使对象趋于整体化、多维度化,观者塑造的他者形象也趋于完整、细腻和有深度。与仅到中国观光的美国作家所描述的中国形象相比,埃德加·斯诺所塑造和描述的中国形象要丰满许多,细腻许多,也更完整,更具立体感。

身份 观者到作为他者的异国旅行、访问或居住,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定的身份。身份是认定自我在异国逗留时的一个法定的必要条件。身份既赋予人既定的合法权利,也相应地对人的活动领域及方式做出某些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份直接决定着观者

在异国能够接触的人群和社会生活的层面。罗曼·罗兰1935年6月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大约逗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后写下了著名的《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中译本易名为《莫斯科日记》)^③。读者从他的书中可看到,他的活动区域仅限于莫斯科,他的贵宾身份又限定了他所接触的仅仅是高尔基、斯大林、布哈林、亚戈达这样的人物以及各地到莫斯科的各界代表团的成员。他通过莫斯科一地及与这些人的接触交往来认识苏联,自然决定了他在塑造苏联形象时的局限性。

视角 在观看他者时,观者始终有其观看的角度,这种观者的视角限定着他的视野,也决定了他者被看的形态。应该说,观看者据其自身的条件和选择观看的视角是多样的。但在多样化的视角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视角是与两种极端身份相关的,一是普通人在观看他者时使用的“自下而上”的视角,二是身份显赫之人采用的“自上而下”的视角。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和中国通,雷吉纳德·F·庄士敦在观看中国晚清及民国时所择取的视角即是“自上而下”的观看方式,他是溥仪皇帝的老师,长年生活在紫禁城内,平时所接触的人皆为当时中国上层社会的要员,他的著述《紫禁城的黄昏》可谓这种视角文本化的完美体现^④。他通过“自上而下”的俯视来观看中国,描绘中国的形象。

先见 在所有制约观看方式的因素中,先见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观看者所拥有的经验世界、知识体系、价值参照、认知方式和伦理取向,决定着他在观看时所持有的立场、观点、伦理态度及价值评判标准。先见盘踞在人内心中,根深蒂固,不可避免地成为定向选择观看他者的方式的有力要素。从疾病与健康的意义来解释人的生命,西方人依据的是他们从其社会文化环境中习得的西医理论,并将其作为解释人体生命现象依据的惟一标准。中医理论与这种标准相悖,因而在他们看来,经络学说是无稽之谈,针灸医术不可思议,刮痧疗法荒谬之极。电影《刮痧》具体展现了这种先